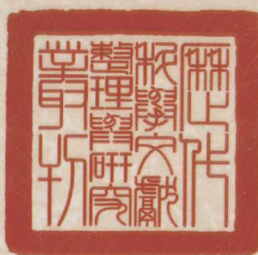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主编 陈文新

历代律赋校注



詹杭伦 沈时蓉等 校注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主编 陈文新

历代律赋校注

詹杭伦 沈时蓉 孙福轩 姜子龙 王猛 饶超 杨广岳 校注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律赋校注/詹杭伦,沈时蓉等校注.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9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07014-1

I. 历… II. ①詹… ②沈…[等] III. ①赋—作品集—中国—古代
②赋—注释—中国—古代 IV. I2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1096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53.5 字数:1167千字 插页:4

版次: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7014-1/I·363 定价:36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傅璇琮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海峰 刘爱松 陈文新 陈水云

张思齐 罗积勇 周 群 赵伯陶

陶佳珞 黄 强 詹杭伦 霍有明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

陈文新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①。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②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36页。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①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问为主体部分，已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一位擅长八股文的才女——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她的那份功课单颇值得留意。“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小姐的这份功课单，明清时代的读书人见了，一定不会有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正是打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鲁编修曾感慨说：“假若是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这提示我们，鲁小姐大体可以代表明清时代的进士水准。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鲁小姐不一定是优秀的学者（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学者），鲁小姐也不一定是文学天才（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文学天才），但她的文化素养之高是不容置疑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是挑选文化素养较高、具有健全的理解能力和丰富常识的官员）。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虽然明清时代进士的总量不大，即使加上举人和生员，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但是，鲁小姐这份功课单的使用人数却远大于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总和，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由此得到了提高。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附带指出：就明清时代的教育体制而言，国家的投资是很小的，其主体部分已分解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国家主要管考，用考试的办法促使国人学习知识，并没有花多少经费在办学上。以较少的国家投入而能达到激励国民普遍向学的效应，科举考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到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道的

^① 余秋雨：《十万进士》，《收获》1994年第4期。

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①。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00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1949年）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思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数。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②。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③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4～115页。

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试就此略作讨论。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多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文天祥是宝祐四年的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面，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宋代如此，明代如此，甚至连元代也是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论及“元末殉难者多进士”这一现象：“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①接下来，赵翼列举了余阙、泰不华、李齐、李黼、王士元、赵珪、周镳、聂炳元、刘耕孙、丑闾、彭庭坚、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迈里古思等死难进士，最后归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②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余阙（1303—1358年）是最早战死的封疆大臣。他的朋友蒋良，一次和他谈起国难，余阙推心置腹地说：“余荷国恩，以进士及第，历省居馆阁，每愧无报。今国家多难，授予兵戎重寄，岂余所堪。然古人有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万一不幸，吾知尽吾忠而已。”余阙殉难后，蒋良作《余忠宣公死节记》，开篇即强调说：“有元设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历历可纪。至正辛卯，兵起

① 赵翼：《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廿二史札记》卷30。

②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6页。

淮、颍，城邑尽废，江、汉之间能捍御大郡、全尽名节者，守豫帅余公廷心一人而已。”^①在余阙“擢高科”的履历与他忠勇殉节的人格境界之间，人们确认有其内在联系。无独有偶，《元史·泰不华传》在记叙元末另一著名的死节之臣泰不华（1305—1352年）时，也着重指出：其人生信念的基本依据是他作为“书生”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在与方国珍决战前夕，泰不华曾对部从说过一番词气慷慨的话：“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书生”“所学”与捐躯“报国”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足见以《四书》、《五经》作为基本考试教材的科举制度，在维持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

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不仅泽及宋元，泽及明清，甚至泽及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其实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原因在于，不少现代名流的少年时光是在科举时代度过的，他们系统地受过这种教育，耳濡目染，其人生观在早年即已确立并足以支配一生。儒家经典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余泽亦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并有意多引他的言论。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世人眼中的胡适，只是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高倡“打倒孔家店”著称。人们很少注意到，胡适在表面上高呼“打倒孔家店”，但在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足够的敬意，是儒家人生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行者。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有胡适的如下自白：“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理学）的运动里，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同一章还有唐德刚的一段插话：“‘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一次我替他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作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理学’这条道理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些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的最后一人。”^②胡适是在少年时代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在经历了废止科举、“打倒孔家店”等种种变故后，儒家的人生哲学仍能贯彻其生命的始终，由此不难想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科举时代，儒家经典对社会精神风貌的塑造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功能。虽然生活中确有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

① 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

② 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33页。

歧的情形，但正面的成效仍是不容忽视的。

“精神文明”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概念。“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就个人而言，需要长期的修养，就民族而言，需要长期的培育。中国古人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所以常常强调“潜移默化”，经由耳濡目染的长期熏陶，价值内化，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大体近于人情，既“止乎礼义”而又“发乎性情”，它对社会的稳定，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功能。目前教育界所说的“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有助于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提高健康的审美能力”，与这个意思是相通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时代的基本读物，人文教育功能是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并因制度的保障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①罗兹曼的意见也许是对的。而我想要补充的问题是：在科举制废止之后，如何才能保证《四书》、《五经》的人文教育功能得以继续发挥？

(三)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它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是我们编纂出版《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初衷，也是我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1. 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唐代杜佑《通典》中特设“选举”类。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等史传、政书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祯《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代登科记多已散失亡佚，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635页。

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代以后的登科记保存较多，明清有关材料更为繁富。

2. 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士奇《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3000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4集，选文480篇，清文1集，选文290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科举文献，一般读者不易见到，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和阅读。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出版预计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前4年（2006—2009年）用来整理出版与科举相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后4年（2010—2013年）内陆续推出10本以上的研究性著作。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批书目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也许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曾有断代或内容单一的科举文献陆续问世，如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出版了《明代登科录汇编》66种（未经整理），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一大套精装本《清代朱卷集成》（未经整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由杨学为主编的7册10卷近千万字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未经整理），龚延明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也在编纂之中。所有这些都极有价值，但它们所涉及的只是一类别，或限于登科录，或限于朱卷，或限于考试，尚不具备综合性的品格。我们这套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而在整理、研究方面投入的心力之多，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的目的是为推进学术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大型出版文化工程。编纂任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学者。参与这一工程的各位专家

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保证了编纂进度和质量；武汉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2008 年 12 月 28 日

于武汉大学

前言

一、赋：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

赋是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学体裁。如果按照文学体裁的四分法，一般分成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赋只能划归散文类，但一般的散文，中国有，外国也有，赋这种特殊的文体则为中国独有。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二分法来看：“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文心雕龙·总术》）韵文类有诗、词、曲、赋，等等，前三种中国有，外国也有，唯独赋这种文体为中国独有。“物以稀为贵”，独特的文体，当然是最具有民族性的文体，而最具有民族性的东西也最容易得到世界性的关注，所以中国的赋学也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从1989年至今，在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已经召开了七届国际性辞赋学学术研讨会。美国学者、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康达维教授说：“若是想给赋下个定义，就像是植物学家想分辨一种植物的名称一般。事实上，若把‘赋’一词和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石楠花相比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十分近似的比喻，而我也常喜欢把赋当作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石楠花有好几种不同的品种：有中国原产的；有交配而成并且常见的新品种。但有些品种甚至不叫石楠花，而叫杜鹃花，表面上既不像石楠花，也不像交配的新品种。中国文学中的‘赋’正如石楠花一般，也包括了几种不同的种类。”^①作为中国人，应该对自己祖国独特的赋体文学有所了解并且能够应用、能够欣赏。当代“百城赋”、“名校赋”、“名胜赋”的创作风气正盛，足见古老的赋体文学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毋庸讳言，与我国辉煌的赋学成就相比，当代社会的赋体文学创作尚未达到第一流的水平。“相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当代赋体文学创作者急需借鉴前人佳作。

我国的赋体文学可以划分为文赋、骚赋、骈赋和律赋等四种体裁，律赋在唐代、宋代和清代是与科举考试相结合的一种文体，所以在这三个朝代都得到迅猛的发展。据《全唐文》统计，唐代流传下来的赋作大约有一千五百篇，其中大约有一千篇是律赋。

^① 康达维：《论赋体的源流》，《文史哲》，1988年1期。

据《全宋文》统计，宋代流传下来的赋作大约有一千四百篇，其中大约有八百篇是律赋。据《赋海大观》统计，清代流传下来的赋作约一万五千篇，其中大约一万篇是律赋。所以，我们说自唐以后，从数量上来看，我国的赋体文学以律赋为主体。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需要，古代士人不得不从小练习作赋，熟能生巧，因此名篇佳作，代不乏人。如唐代李程的《日五色赋》、宋代范仲淹的《金在铉赋》、清代吴锡麒的《伏波铜柱赋》等，均脍炙人口。鉴于前此“历代文学作品选”一类著作选录律赋较少，笔者长期研究唐代、宋代、清代律赋，特组织我所指导的学术团队共同协作，精选唐代、宋代、清代律赋共三百余篇，加以题解和详细注释，排印出版，为当代赋学研究和赋体文学创作提供典范的作品，以飨读者。这里先谈谈与赋学有关的问题。

二、赋的名义与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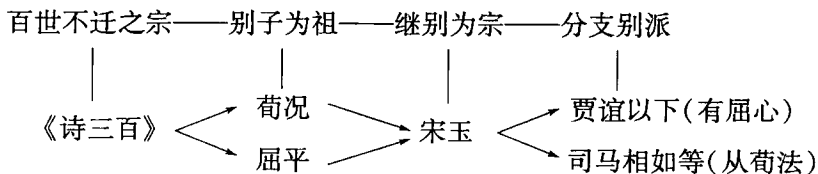
（一）赋的名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赋者，铺也，采用汉人的声训。《楚辞·九章·悲回风》：“窃赋诗之所明。”王逸注：“赋，铺也；诗，志也。……铺陈其志，以自证明也。”《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二曰赋。”郑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显然汉人没有明显地将“赋”与文章的写作相联系，首次将六义之赋与赋体相提并论的情况见于晋朝左思、皇甫谧分别为《三都赋》写的《序》中，如皇甫谧的《三都赋·序》说：“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其后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诸人之说，逐渐从诗杂有赋体——即铺陈之体的角度立论，由此肯定赋出于诗之说。这一脉相沿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篇，就此成论。即赋体是由敷陈的写诗法发展而来，并逐渐独立，而形成的一种文体。刘勰说赋的文体特点是“铺采摘文，体物写志”，即铺陈事义，挥洒文采，描状事物，抒写情志。这里说赋写作的对象包括向外和向内两个方面，比较全面。前此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如果不理解成两句互文见义，那就容易理解成诗与赋各有不同的表现对象；其实既有体物的诗，也有缘情的赋，像刘勰这样内外兼说，就比较全面地表达了赋体的功用。

（二）赋的起源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又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者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刘勰在这里主要讨论赋的起源，结合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的看法，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赋学源流。王芑孙在《读赋卮言·导源》中论述道：“荀况《赋论》言：‘请陈俛诗。’班固言：‘赋者，古诗之流。’曰‘俛’，旁出之辞：曰‘流’，每下之说。夫既与诗分体，

则义兼比兴，用长箴颂矣。单行之始，椎轮晚周。别子为祖，荀况、屈平是也；继别为宗，宋玉是也；追其统系，《三百篇》其百世不迁之宗矣。下此则两家歧出：有由屈子分支者，有自荀卿别派者。昭明序《选》，所以云荀、宋表前，贾、马继后，而慨然于源流自兹也。相如之徒，敷典摘文，乃从荀法；贾傅以下，湛思妙虑，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变，马愉而贾戚，虽云一轂，略已殊途。”从刘勰到王芑孙所揭示的赋学源流可以图示如下：



这一赋学源流图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

(1) 坚持“赋自《诗》出，分歧异派”的一元论

今之论者或以赋名之骚体、散体、诗体分别溯源，为其各有所自，不相统摄，但其弊正如周祖谟先生所说：“作为总名之赋体之渊源无所依归矣。”^①程章灿先生认为：“赋者古诗之流说，若从某一特定方面看，自有其似非而是之处。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指出：‘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是很精辟的。”^②其实，王芑孙指出赋乃《诗》之“旁出之辞”、“每下之说”，已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先见之明。今之论者批驳赋为古诗之流说，或谓诗六义说出现于赋体产生之后，不得视为赋体渊源；或谓赋有二义，一为修辞法门，实为动词，二为文体，实为名词，貌同心异；或谓赋体兼用比兴，与文义之赋专指铺陈不同。诸说虽辩，但王芑孙早已指出“赋既与诗分体，则义兼比兴”，这说明赋出于《诗》，是一种文体脱胎于另一种文体，而不仅仅是继承了一种修辞手法；若就艺术手法而论，赋体则全盘继承诗体，以赋为主，比、兴兼而有之。因此，赋为古诗之流说是难以动摇的。

(2) 荀况与屈平同居赋学始祖的地位

《汉志·诗赋略》以荀卿赋、屈原赋、陆贾赋并列为三家。陆贾为汉人，可置而不论。荀况、屈平理所当然为辞赋之祖。今之论者，或仅以荀赋为诗体赋、四言赋之所出；或认为荀赋亦出自楚辞，始祖仅有屈赋一家，皆有意无意地贬低了荀赋的历史地位。王芑孙则从儒家的义理出发，认为虽然“飙流所始，同祖风骚”，但“荀正而屈变”，荀赋继承了纯正的风雅传统，“《礼》、《智》之篇，义征载道：《箴》、《蚕》之作，理在前民：附庸六义者也”。而屈骚则对《诗三百》的传统有所变异，“屈变”之说，出自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即有“变乎骚”之论；《文心雕龙·辨骚》篇更摘《离骚》“同乎

^① 见周祖谟：《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录早期作家之籍贯、身份推测赋体之来源》，《新亚学术集刊》，第13期，第74页。

^②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风雅”者四事，“异乎经典者”四事，两相对照，以明其变之迹。当然，王芑孙对“屈变”也并不贬低，而是主张一正一变相辅而行，共同享有辞赋始祖的地位。

(3) 宋玉赋是荀、屈赋与汉赋之间的中介

今之论者，多以宋玉为屈原弟子，自以屈、宋连言，认为宋玉仅仅承袭了屈赋的传统。王芑孙则以荀、宋连言，认为宋玉继荀况之后继承了风雅传统，“《高唐》《神女》，有孔子殷勤之意，犹之风诗”。这一观点也受到刘勰影响，《文心雕龙·诠赋》有云：“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当然，以宋玉接荀况并不意味着不以宋玉接屈原，宋玉赋应视为继承荀、屈赋的合体，并向汉赋二体作出投射的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4) 汉赋二体与荀、屈之关系

汉赋存在以贾谊为代表的骚体赋和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散体文赋两种体裁。王芑孙进一步论证的是汉赋与荀、屈之关系。王芑孙指出“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贾傅以下，湛思妙虑，具有屈心”，是有其根据的。盖荀赋以体物为主，采用主客问答的格式，并具有“事数自环”的骋辞特色，这些都为汉代散体赋家所继承；而贾谊与屈原心心相通，情感合拍，更是不争之事实。难之者或以为，屈原《橘颂》乃体物佳构，而《卜居》、《渔父》亦设主客问答，故当以汉代散体之源归之屈原。其实，屈原的代表作当数《离骚》，他对汉赋之影响亦主要在此而不在彼。芑孙在指示“相如之徒……乃从荀法”时还特别指出，“马既腾声，扬旋飞躅；《子虚》《上林》，《甘泉》《羽猎》，锵洋鸿丽，有《清庙》《噫嘻》之响，《般》《桓》《甫》《草》之音，抑亦雅颂之亚也”。可见他是从接轨《诗三百》正宗之角度来体认汉代散体赋与荀赋关系的。当然指出相如从荀法，贾谊有屈心，并不意味着相如便不受屈原影响，也不意味着贾谊便不受荀况影响，实质上这只是一个主要次要、孰轻孰重的问题。因为相如、贾谊接受荀、屈影响之间还通过了宋玉的中介，所以这已是经历了综合基础之上的分歧，正如东西方人结合而产生的混血儿，尽管也有黄头发、黑头发的分别，实质上已有许多的共通之处，难以分辨得一清二楚。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难以理解《文心雕龙·辨骚》所谓“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了。

综上所述，从刘勰到王芑孙所揭示的赋学源流关系，比较符合赋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迄今为止，仍不失为在对赋学源流的学术探讨中值得重视的一家之言。

三、赋的体裁辨析

(一) 前人赋体分类的检讨

汉代的赋作，本来只有“骚体赋”和“散体文赋”这两种体裁。王芑孙论及的汉赋两

家，指以贾谊为代表的骚体赋和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散体文赋。今之论者有分汉赋为三体(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或五体(诗体赋、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俗赋)者，分类标准不统一，似难据信。不少学者仍然支持二体的分法。如程千帆先生指出汉赋主要有两类，“一则畸于抒情，乃汉赋之别派；一则畸于写实，乃汉赋之正宗。作者或兼具二长，或专攻一体”^①。周祖谟先生也指出，就现存的司马相如之前赋作考察，“概而论之，可分两类：一为楚辞体，纯抒情之作；一为散体，皆是体物之辞”^②。

后代的赋体，都是在汉代赋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元人祝尧在司马迁《子虚赋》、《上林赋》下评说：“赋之问答体，其源自《卜居》《渔父》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而盛，此两赋及两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驶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③明人许学夷在引用祝尧这段话后加按语云：“古今赋体之变，此为尽之。”^④清人《四库全书总目·古赋辩体提要》亦评祝尧此语：“于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⑤何焯则对祝尧此说有所补充，他说：“按首尾虽以议论问答，然车驾千乘等句，即以赋齐王之猎，后半齐东隋巨海等句，即是赋齐国游猎之地，则亦未尝非赋也。后人无铺张之才，纯以议论为便，于是乖体物之本矣。”^⑥何焯的这一补充很重要，说明《子虚》《上林》首尾之“文”也是符合铺陈要求的赋体，不得对祝尧之说作断章取义的理解。

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阐述历代赋体流变，将赋分为四体：

故今分为四体：一曰古赋，二曰俳赋，三曰文赋，四曰律赋。^⑦

徐氏的赋体分类说明尽管洋洋洒洒，但是并未能理清赋体分类的源流正变，反而造成了两点混淆：一是徐氏所谓的“古赋”，包括两种赋体：贾谊的骚体赋，司马相如、扬雄的文体大赋，若混合不分，不免将骚体赋与文体赋混为一谈；二是按照徐氏的分类法，我们需要在古赋、俳赋、律赋之外，来找文赋，这就给辞赋辨体造成很大的困惑。

① 程千帆：《赋之隆盛与旁衍·汉赋流别》，《闲堂文藪》，山东：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42页。

② 周祖谟：《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录早期作家之籍贯、身份推测赋体之来源》，《新亚学术集刊》，第13期，第75页。

③ 祝尧：《古赋辩体》，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卷三《两汉体上》司马迁《子虚赋》评语。

④ 许学夷：《诗源辩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古赋辩体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⑥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版。

⑦ 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1页。